

新中国五年计划研究

杜福 编著

XIN ZHONGGUO WUNIANJIHUA YANJIU

5.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新中国五年计划研究

杜福 编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四子王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印张：7.625 字数：149千

1989年5月第一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65册

ISBN 7-204-00747-3/F·20 每册：2.30元

序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跨入了第四十个年头，在这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三年调整时期和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计划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认为：“区分不同经济体制特征的基本方式是：分配决策主要是集中的并由国家行政当局协调，还是基本上靠企业和家庭独立地制订，并通过市场和价格体制协调。”^①按照这种方式划分，前者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体制，后者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计划体制决定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性质，规定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道路，所以研究和探索我国七个五年计划的历史演变过程，其本身便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在方法上的突破。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大国里，大的宏观决策方面的正确与否是决定整个经济发展过程所追求的目的和期望实现程度的先决条件。因此，对由七个五年计划贯穿起来的宏观决策进行历史性的回顾，便显得尤其重要。杜福同志的《新中国五年计划研究》一书，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长期以来，我们在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战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的根据之一，就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国民经济

的计划体制，使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有计划、按比例地向前发展。但是在四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我们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农业人口占80%以上、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缺乏历史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对于在这样的一个大国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初始阶段，在宏观决策方面就已表现出了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思想。这种思想伴随着初始阶段在经济建设上的巨大成功，逐渐占据了计划编制工作的主导地位。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计划的编制由于片面强调加快经济建设，忽视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它的目的，从而导致了国民经济多次的比例失调。由失调到被迫调整，由调整到协调，再到失调，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被控制在一个难以摆脱的“怪圈”之中，使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作者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过程中独具慧眼，鲜明地指出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期，刚刚建立起来的计划体制就已经暴露出了日后难以克服的、制约着经济发展的弊端，这无疑本书中的可贵之处。

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本书中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汇集了我国建国以来近四十年的大量的经济、社会统计资料，并且进行了决算、分析和比较。对于每一个五年计划的得失，作者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也都给予了客观的历史总结。虽然有些思路和结论并不一定正确和准确，值得商榷的地方还很多，但作者为今后对四十年来宏观决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深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将会有更多的有识

之士介入，并取得更好的成果。

当然，本书中也同样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首先，在我国四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计划体制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中包括机构的设置、计划的编制、修订等，它的发展和变化是否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是否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以及在目前新旧体制交替的时期，计划体制的改革方向是什么等问题，应是本书的题中应有之义。可惜作者由于资料的限制对此未能涉及，这无疑是本书中的一大缺憾。其次，作者虽然对于历个五年计划的得失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但却仅限于客观的描述，缺乏理论上的深刻说明。例如反映在历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经济过热现象时至今日依然存在，是与宏观决策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当然，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决非作者一个人的能力所能为，需要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第三，作者在记述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时，未能突出地区或区域特点。象沿海地区、内地以及边疆落后地区在计划的编制和执行过程中各自采取了哪些发展政策，这些政策取得了哪些成效，是加剧还是减缓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有无全国一刀切的弊病等，都缺乏详尽的深入细致的分析。尽管存在着上述缺点，但本书瑕不掩玉，不失为一本好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读了杜福同志这本书之后，读者是会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心和热忱的。

袁志发

①【瑞典】罗夫·艾登姆、斯塔芬·威奥第《经济体制》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04页。

结 论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于世界东方已整整四十个春秋。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面临着迅速发展经济，以摆脱长期贫困落后状态的艰巨任务。如何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和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成为举世瞩目的大问题。

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了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就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行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创造了条件。

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人类的发展已经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貌就将一年一年的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①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50页。

经济计划是人类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对经济发展的预测和构想，它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及其发展的认识和控制。经济计划是否正确，从根本上来说，只能以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作为检验的标准。四十年来，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国家经济计划的宏观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本上实现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民经济改造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在此基础上，实行了计划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社会变革，它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二）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建立起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52年至1988年期间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4783多亿元，更新改造投资完成6185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许多工业基地和工矿企业，改变了旧中国的极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建设都在飞跃前进。1952年同1988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由810亿元增加到23718亿元，增长了28.3倍。国民收入由589亿元增加到11533亿元，增长了18.6倍。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240.6亿元增加到13195亿元，增长了54倍。四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与发达国家的距离相对缩短。

（三）商业、外贸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都有很大发展。

国内商品零售总额由1952年的277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7440亿元，增长了25.9倍，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52年的19.4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1027.9亿美元，增长了50.7倍。我国城乡市场繁荣，绝大部分年代物价比较稳定，以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崭新面貌和少有的活力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在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的原则下，已同世界上17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

（四）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高等学校毕业的人数由1952年的7.2万人增加到1988年的55.4万人，研究生毕业人数由1952年的627人增加到1988年的40700人，中小学有更大的发展。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培养了一支具有一定数量和水平的科技和管理干部队伍，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自然科学技术人员由1952年的42.5万人发展到1988年的960万人，增长了20.9倍。1978年以来，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迅速，全国有数万项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获得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奖励，经国家批准的发明有1364项。工业技术和科研技术的某些方面已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民消费水平由1952年的62元，提高到1988年的54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外，提高5倍左右。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由1952年的148元增加到1988年的1119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提高了3倍。城乡人民储蓄存款余额由1952年的2.6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3807亿

元，增长了441倍^{①②}。由于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各族人民的体质大为增强，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已达69岁。在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大国，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使11亿人口的绝大多数过上了温饱的生活，部分地区开始向小康生活前进，永远结束了广大人民饥寒交迫的惨痛历史，这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不是经历几度折腾、耽误的时间太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然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由此可见，计划经济制度的确立在中国显示了巨大的威力。特别是在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着如何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工作就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作为国家计划体系基本环节的五年计划，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

二

我国的计划经济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起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逐步建立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改变了社会生产的性质和目的，这是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

①国家统计局《关于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人民日报》1989年2月24日。

②《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第20—29页。

计划经济，实行计划经济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相结合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各个生产部门日益增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这就决定了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企业之间必然需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不仅要有彼此的产品在品种、质量、规格型号上互相适应，而且要使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按比例分配，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消灭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矛盾，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无法克服的各生产部门之间、各企业之间的利益对立，克服了一切人为限制和阶级障碍，把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企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有可能对社会再生产进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管理。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又有赖于计划经济制度的加强与完善。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还为我们自觉地调节生产，准备了前提条件。社会主义的调节方式主要是计划调节，在经济活动中，一切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都必须由国家计划加以控制。

但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计划调节的范围多大、程度多高，要取决于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归根到底还是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低下，商品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也低，这就不同于马克思曾经设想的生产

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的那种情况。因而实行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则虽然是和马克思设想的相一致，而实行计划经济的广度和深度却有很大差别。这就要求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生产资料不能实行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只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结构。与此相适应，在经济计划工作中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又要积极发挥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就是说，既要坚持计划管理，又不能硬性扩大计划管理的范围，不能管得过宽、过死、过细。实践经验证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

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是客观存在的，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要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就必须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计划经济的本质要求，是保持重大比例适当，坚持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的有机结合，以促进国民经济大体按比例地、高效益地发展，在劳动还通过价值表现的条件下，离开了对价值及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就不可能正确的核算和分配劳动。这说明，以调节和分配社会劳动为基本内容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和贯彻，都必须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否则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发挥。我国“二五”时期“大跃进”失误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严重影响了劳动的节约和合理分配，结果妨碍了计划经济优越性的发挥，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可见，现代化大生产的

高度社会化，需要计划的指导，而现代化大生产的高度商品化又离不开发达的市场，因而必须坚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力量和中坚力量，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组织、检查和保证监督是实现经济计划的重要政治条件。离开这个条件，计划经济就无从谈起。明确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削弱甚至否定党的领导，我们就无法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地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党对计划经济工作的领导包括很多方面。主要是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来体现，通过制定科学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来体现。坚持党的领导，不是要恢复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统一的“一元化”领导，但是，任何时期计划任务的提出，计划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和党中央的路线与基本方针、政策保持一致，这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标志。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建立计划体系和计划网络，使计划纳入科学的轨道。国家计划体系是实现计划经济的中心环节，是国家一定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方针政策的具体化。比较完整的计划体系应该是长期计划〈远景〉，中期计划〈一般以五年为期〉和年度计划的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的结合。这种三位一体的计划体系，是保证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全面搞好综合平衡的重要条件。

五年计划是计划体系的基本环节，是实现综合平衡、保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形式。

这种中期计划是实现长期计划的具体计划，又是短期计

划的综合计划，它把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衔接起来，把长期计划规定的战略目标具体化。五年建设计划，按照目前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在时间上大体符合许多工业、大中型水利、交通等建设工程的建设周期，符合许多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和重大科研项目所需要的期限，有利于充分吸收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符合专门人才的培养周期。实行五年计划能够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比较详细的计划核算，能够比较有效地分配资源，兼顾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比之长期计划，可变因素较少，能够确定较为具体的数量指标。同时，实行五年计划有利于充分发挥五年的战略指导作用，使人民群众有一种鲜明的“阶段”感，这对于动员和鼓励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有重大作用。因此，五年计划对于有效地组织和实现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

我们对计划经济的认识和实践，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逐步完善的过程。三十多年来我国先后制定和执行了七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六个、第七个五年计划比较好。这几个五年计划主要是在思想上坚持实事求是，注意综合平衡，在发展速度上留有余地，重大比例关系安排的比较恰当，计划内容比较详尽，因而对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中间几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出了不少问题，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较大的起落。在这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我国的经济建设也获得了一定成就，但是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我们付出的巨大劳动和消耗的大量

自然资源相比较，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经验不足。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十月革命算起不过七十年，我国才只有四十年。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不仅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创新之举，而且在世界上也无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全靠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去实践，去创造。由于时间短暂，我们还没有积累起足够的经验来合理地、正确地运用这个先进的制度。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犯了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错误。正如陈云同志所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①。在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原理的时候，没有始终注意同中国的国情紧密结合，没有按照我国的实践经验加以发展。还有一段时间人所共知，是由于反革命集团阴谋破坏造成经济工作的重大失误和折腾。这就是说，过去经济发展计划的失误和挫折，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造成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固有的矛盾导致的。相反，我们正是依靠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实现了拨乱反正，不断地纠正经济计划工作中出现的错误，把比例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有效地调整过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端正了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计划工作上，有许多新的创造，从而使我国国民经济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

^①陈云：《经济形势和经验教训》，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政策、文献选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

道。这就充分证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比之资本主义制度有巨大的优越性；同时也证明，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如何总结计划经济工作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

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中前进的。在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东方大国，如何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很多重大问题有待于解决。因此，总结我们计划工作的经验就更加重要。特别是应当重视总结那些反面经验，以避免重蹈覆辙。恩格斯曾经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①敢于正视自己弱点的人，是真正的大智大勇者；敢于揭示自己隐患的民族，才是大有希望的伟大的民族。

60年代初，当我国在执行第二个经济发展计划中遇到极大困难时，我们党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周恩来同志当时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十分重视从缺点和错误中取得的经验教训。我们从工作的成就中取得了正面经验，从缺点和错误中取得了反面的经验。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很好地从经验教训中学习，这些反面的经验就能够同正面经验一样，成为我们极为有用的财富。正是由于这样做了，我们在严峻的三年困难时期，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经济调整，仅仅三年时间，就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使国民经济重新纳入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时过不久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85页。

整个经济就开始全面高涨，出现了“柳暗花明”欣欣向荣的景象。那次经济调整提供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

然而，由于“左”的思想影响，过去我们在总结经验方面，曾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某些方面曾经成了禁区，不能涉及，只能反“右”不准反“左”，这就使我们在长时期内无法全面地正确地总结经验。有些成功的经验没有系统化上升为科学的理论，有些严重失误，虽然纠正了但不能从根本上揭露这种失误所造成的危害，更不能铲除其根源。历史的悲剧和闹剧不能彻底清算，这种悲剧和闹剧就会重演。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二十余年中，经济计划一次次地出现高指标、高积累、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根源就在于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深刻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全面认真地清除了“左”倾错误，我国的计划经济就逐步走上一条速度比较适当，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能够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并且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

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征途上，我们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还在发展。我们坚定地相信，在党的十三大基本路线和经济发展战略指引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将会创造出更加光辉的业绩。

后 记

编写《新中国五年计划研究》的目的是想为各级党校、干校、财经院校师生学习中国现代经济史提供一个参考读物，也是为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介绍我国各个五年计划的历史进程，以便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同时，这本书也为国外关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机构和个人提供一定的研究资料。

书中所用资料除引自公开出版的书刊、报纸并注明来源外，有一部分是根据有关资料加工计算的。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内蒙古自治区党校顾问、自治区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李子欣副教授的关怀。他就本书的初稿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并对部分章节作了修改。又蒙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经济学会理事长暴彦巴图、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袁志发、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白亚光、清华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沈瑞云、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教授翁志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新中国经济史副研究员李志宁等审阅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编写过程中，还参考和吸收了有关方面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编 者

一九八九年四月